

## 媒體與軍隊關係的演進： 戰時新聞媒體管制與運用的發展

胡光夏

副教授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 摘 要

本研究是以消息來源與媒體互動的觀點為基礎，並採取歷史與文獻分析法，來檢視不同戰爭中，政府與軍方採取何種方式與媒體互動，並演變成近代的媒體管理思維與策略。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媒體與軍隊間的關係演變，並特別著重在不同的戰爭中，孕育出那些的管制思維與措施，以及這些思維與措施對於後續的媒體與政府關係的影響。

本研究計分為六大單元，首先是前言；其次是探討透過近代報紙報導的克里米亞戰爭；第三單元探討在蓬勃戰爭報導時期的不同戰爭中的媒體與軍隊的互動關係；第四單元檢視總體戰時期的媒體與軍隊的互動；第五單元則是美國全國媒體聯合採訪制與記者隨軍嵌入制的發展與應用；第六單元是結論。

**關鍵詞：**戰時媒體管制、媒體與軍隊關係、克里米亞戰爭、越戰、波斯灣戰爭

#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Military: The Development of News Media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t Wars**

Guang-shiash H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ews sources and media,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study the methods the governments and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adopt to interact with the media during the periods of war. In addition, by using the historic and documentary methods,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media management and media control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military.

The objectives of this paper focus on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military, especially on the developments of media control and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wars, and on how these control measures influence the futu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firstly, the introduction; secondly, the Crimea War; third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war reporting; fourth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World War I and II; fifthly,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pool and embedded system ; finally,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 Media Management at W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Military, Crimea War, Vietnam War, Persian Gulf War**

## 一、前言

基本上，科技的發展與運用改變了戰爭的本質。Alvin Toffler 與 Heidi Toffler（傳凌譯，2003）在其所著《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一書中，將戰爭的型態分為三波：農業、工業和資訊。俄羅斯軍事理論家如斯利普琴科則以戰爭的起始年代、武器系統、主要能源、戰術和特點等，將戰爭型態的演進區分為六代：冷兵器、火器、近代火器、機械化、核戰爭和資訊化戰爭（轉引自王凱，2000，頁4）。Webster（2003）將現代戰爭類型區分為兩種型式：工業戰爭與資訊戰爭。工業戰爭的期間是從1914年至1970年代，1970年代以後則是屬於資訊戰爭。Carruthers（2000）則依動員與發生的規模，將戰爭分為三種，即總體戰爭<sup>1</sup>（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局部戰爭（如福克蘭戰爭與波斯灣戰爭）、以及恐怖主義或國家內部戰爭（如英國的北愛爾蘭）。

傳播媒體對於戰爭的報導型式，也深深受到傳播科技發展的影響。McLuhan（1964）在《瞭解媒體》（*Understanding Media*）一書中，將人類歷史的演進依媒體發展，區分為口語、文字、印刷和電子傳播等四個時期。Virilio（1989, p. 7）曾指出，「戰爭的歷史是一種視野快速改變的歷史。」從傳播媒介在戰爭報導中的應用，可以瞭解到隨著傳播科技的演進，在不同的戰爭中，傳播媒介所「中介」（mediated）或再現（represented）的戰爭景況，確實有著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間的戰爭報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戰爭的本質改變了，由總體戰爭轉變為局部戰爭，使得民眾不再與政府完全綁在一起，再加上民眾教育的提升與公民權的成長，使得媒體可以在其中扮演著獨立的角色。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新傳播媒體如電視、有線電視、衛星電視與網際網路等媒體陸續的出現，在採訪設備上也由原先的類比進入到數位科技，使得傳播速度加快，而媒體與軍隊間的關係亦隨著改變。

Young 與 Jesser（1997, pp. 273-274）將媒體與軍隊間關係的演進區分為三個時期：帝國主義時期、蓬勃戰爭報導時期與總體戰時期。在帝國主義時期，由於傳

---

<sup>1</sup> Carruthers（2000, p. 12）指出，總體戰的年代是從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開始，其中扮隨著民兵（the citizen army）思想的出現。法國革命是前所未有的動員整個社會參與戰爭，並且扮隨著全民參與戰爭的意識型態。歐洲各國後來都跟隨著法國的模式。而美國的內戰則是更進一步的為了戰爭動員工業經濟。第一次世界大戰則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全面戰爭的後方是戰爭勝利的成功關鍵，並被視為整體戰爭的一部份。平民被動員投入經濟生產的力量、人力的一個來源、以及大規模花費的政治擁護者。全民的精神動員被視為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力量，因此，軍事的企劃者自然開始關切民意系統的管理與媒體的相關問題（Hallin, 1997, p. 208）。

播科技不發達，從戰地傳遞回國內曠日費時，且媒體大都很少質疑國家的政策，因此，媒體對於帝國主義者的軍事目的很少產生威脅。然而，從克里米亞戰爭開始，由於新的電纜與電報等傳播科技的運用，加快了媒體報導的速度，戰地記者的報導開始對於戰爭的進行產生了影響，特別是經由報導對國內民意的影響，使得戰爭報導進入了蓬勃時期。此一時期，一直到日俄戰爭（1904年）爆發後結束。各國政府與軍方對於此一變化的回應是，逐漸將一些審查體系機制化，以及採取限制傳播工具的使用等方法。以美國為例，該國政府與國防部隨著戰爭的試煉，逐漸發展出一套精緻化的媒體互動政策與策略，學者（如 Kellner, 1992）將美國於 1990 年代起所發動的戰爭，稱之為「公關化」或「媒介化」的戰爭。

檢視國內相關研究，較缺乏從歷史的觀點，以及有系統性的來檢視媒體與軍隊間的互動，特別有關戰時管制的思維與策略的發展歷程。筆者期望能藉由本研究分析，彌補此方面的文獻的不足。

本研究是以消息來源與媒體互動的觀點為基礎，採取歷史與文獻分析法，來檢視不同戰爭中，政府與軍方採取何種方式與媒體互動，並演變成近代的媒體管理思維與策略。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媒體與軍隊間的關係演變，並特別著重在不同的戰爭中，孕育出那些的管制思維與措施，以及這些思維與措施對於後續的媒體與政府關係的影響。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為：在各種不同時期的國際政治和軍事衝突中，各國政府與軍隊對於媒體所採取的態度為何？不同的媒體管制措施如何產生？這些的管制思維與措施如何影響到資訊化戰爭的媒體管理？

## 二、克里米亞戰爭 ( The Crimean War ) ( 1853-1856 )

在人類歷史上，有關戰爭的記載或報導可以區分為官方與民間。在現代的報紙媒體出現之前，東西方有關戰爭的報導或記載主要是以官方為主。有關戰爭的民間報導一直要到現代報紙出現後才有。

基本上，一直到 1843 年電報出現前，軍方都不用太過於擔憂媒體記者在戰地的報導，會洩露軍情消息給敵人，也不用擔心報導會對民意產生影響，因為媒體報導的速度較慢且不具時效性。但自從電報出現後，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由於媒體訊息透過電報的傳送，使得報導的速度加快，而軍方與政治人物開始要擔憂媒體的報導會對於民意產生影響（Bennett and Paletz, 1994）。克里米亞戰爭就是首開其端的一個戰爭。該戰爭對於媒體與軍隊間的關係具有兩項重要的意義：開啟平民報導戰爭的先例與埋下了媒體與軍隊間的潛在緊張關係。

### (一) 開啟平民報導戰爭的先例

在東方歷史上最早有關戰爭的文字記載是，發生於大約西元前 2698 年的涿鹿之戰，當時黃帝部落利用地形，誘敵深入，打敗了南方的蚩尤部落（馬劍，2004）。西方有文字記載的戰爭則出現於西元前 1469 年，埃及法老圖特摩斯三世在巴勒斯坦的麥吉多山口，運用「戰車部隊」擊潰叛變的部落（倪樂雄，2002；周俊雄，2004）。

西元前 50 年，羅馬時期 Gaius Julius Caesar 大帝曾下令在議事廳外與羅馬城內的顯眼處，張貼《每日紀聞》（act diuran），其內容包括官方通告、戰爭、宗教和競技等，主要是手抄本，且數量有限（李茂政，1999；游梓翔、吳韻儀譯，1994）。儘管《每日紀聞》屬於官方的報導，且內容包羅萬象，但其型式已具有平面媒體報導戰爭的雛型。

早期這些東西方有關戰爭的文獻記載，主要是由參戰官兵士以作為「官方目擊者」來加以所撰寫，因此，此類報導通常會較強調勝利，而對於失敗則予以藐小化處理（Taylor, 2003），而並非是如近代媒體具有時效性的戰爭報導。

專業戰地記者是隨著近代報業的發展才出現的。儘管有關第一位專業戰地記者是何人的說法不一<sup>2</sup>，Kinghtley（1975）與 Young and Jesser（1997）卻認為，第一位專業戰地記者（war correspondent）是為倫敦《時報》（Times）報導 1807 年拿破崙在 River Elbe 戰略的 Henry Crabb Robison。但倫敦《時報》<sup>3</sup>記者 William Howard Russell 卻是首位突顯在現代戰爭中的媒體力量與問題的記者（Young and Jesser, 1997）。

一般大都認為，Crimean 戰爭<sup>4</sup>是開啟平民報導戰爭的重要先例（Hiebert, 2003）。

### (二) 首度埋下日後軍隊與媒體間互動的潛在緊張關係

克里米亞戰爭是「電報」首次在政府決策與新聞媒體報導上發揮驚人影響力的戰爭，也使得戰爭報導的公共面貌產生變化。參與該戰役報導的英國《時報》記者 William Howard Russell 被稱為是現代戰地記者先驅者之一。與他一起採訪該戰爭的還包括《時報》記者 Thomas Chenery、《晨間論壇報》（*The Morning Herald*）記者 Nicholas Woods 與《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sup>2</sup> 有人認為，1842 年 2 月，英國倫敦《時報》記者 William Howard Russell 隨英國遠征軍赴地中海的 Malta 採訪，是世界的第一位專業戰地記者（請參考周俊雄，2004）。

<sup>3</sup> 倫敦時報是《泰晤士報》的前身。

<sup>4</sup> Crimean 戰爭是俄國對抗土耳其、法國、英國和薩丁尼亞聯軍的戰爭，兩軍在俄國南部黑海的克里米亞半島對峙長達一年，造成了 70 萬人死亡，英國的護士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曾組織護士隊伍加入遠征軍。

記者 J. A. Crowe (Young and Jesser, 1997)。然而 Russell 與深具有才華編輯 John Thadeus Delane 的合作，才使該戰爭吸引了英國民眾的目光。

Russell 從英國遠征軍戰地所傳送回英國倫敦的報導，揭露了英軍裝備的缺乏與領導力不足、官兵生病、戰爭死傷等問題，震撼和感動了英國民眾 (Young and Jesser, 1997; Taylor, 2003; 程之行, 1995)。他的客觀報導充份曝露了軍方與政府的缺失、疾病與大膽盲進，是導致戰爭失利的主要因素，而促使英國輿論要求政府相關單位要立即改進這些缺失。Russell 的報導為日後戰地記者的報導立下了判準，但他的客觀報導因為防礙了軍事目的，也被說成是協助蘇聯「顛覆英國政府」(Knightley, 1975; Furneaux, 1964; Mathews, 1957; Young and Jesser, 1997)。

Russell 與 Delane 的共同合作，對於悲慘與殘酷戰場景況的描述與報導展現了戰地記者的力量，引起民意激烈的迴響，最後導致 Aberdeen 政府於 1855 年下台 (Young and Jesser, 1997)。因此，埋下了軍隊與媒體間互動的潛在緊張關係，也就是平民記者的戰地報導不僅是危險的，且是不可靠的。而英國軍方也萌生對於媒體的管制 (censorship) 是確保媒體與公眾支持戰爭的一個重要途徑的想法 (Taylor, 2003)。

事實上，在 Russell 的報導未引起重大民意衝擊之前，克里米亞戰爭對軍方而言是一個機會，那就是在戰爭期間為新聞檢查奠定了一個新的法律裁決基礎，即凡涉及到軍事行動場面的影像都應受到審查，這是現代媒介史上的首次 (陳衛星譯, 2005)。

由於在克里米亞戰爭前，近代攝影術已成功的發展出來，英國攝影師 Roger Fenton 被准許可以搭乘載有移動式暗房的馬車到戰場拍攝戰場的情景，開啟了利用近代攝影術來記述戰爭的先例。而英軍以不要使官兵家屬感到害怕為由，要求他應小心謹慎地避免在照片中呈現出恐怖的戰爭場面，結果在其所拍攝的 360 張照片中所呈現的戰爭景像，就如同是一場野餐 (傅大為, 2003; 陳衛星譯, 2005)。

這種人為擺設所拍出來的照片與後來《時報》記者 Russel 的報導截然不同。Russel 描繪了在 1854 年 10 月 25 日發生在 Balaklawa 的戰役與殺戮，當時有 400 至 600 百名英國騎兵在被派遣去攻擊俄軍大炮陣地時喪生，使得國會和輿論遭受前所未有的刺激。於是在 1856 年 2 月，英國軍方最高當局決定對於新聞自由加以限制，規定前線報導必須要有軍方派遣的人員參與 (陳衛星譯, 2005)。

Russell 也是進入軍事安全灰色地帶的先驅。儘管他曾將報導交由軍方做安全審查，但他仍被指控經由報導洩露機密給俄國情報單位<sup>5</sup>，違犯了間諜法 (Young and Jesser, 1997)。

---

<sup>5</sup> 主要是指 Russell 報導英國遠征軍生病等缺失，將軍隊的現況經由報紙曝露給俄軍。

### 三、蓬勃戰爭報導時期

Kinghtly (1975)將1860年至1910年間的戰爭報導稱之為蓬勃期(The golden age of war reporting)。這60年間所爆發的著名戰爭包括：美國內戰(1861-1865)、法普戰爭(1870)、蘇丹戰爭(1898)、美西戰爭(1898)、以及波爾戰爭(1899-1902)。這些戰爭除了美國內戰外，大都是屬於為殖民地或在殖民地所進行的戰爭。戰爭報導的蓬勃期在日俄戰爭(1904-1905)爆發後劃下句點(Young and Jesser, 1997)。

#### (一) 美國內戰(1861-1865)

美國內戰於1861年4月12日爆發，於1865年4月9日結束。在3000多次的南北兩軍交戰中，死亡總數高達50萬人，其中有半數是死於生病或疾病。美國內戰死亡總數超越從獨立戰爭(Revolutionary War)到越戰的總合(<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內戰是美國首次見到傳播科技對於媒體報導的影響(Young and Jesser, 1997)，也正式宣告戰地記者時代的來臨。電報與相機是報社的主要傳播工具。

對美國而言，有機制性的報導戰爭是從內戰才開始。內戰時期的記者Mathew Brady與他的助理Alexander Garder曾對許多的主要戰役作了報導。他們兩人似乎知道那裏會發生激烈的作戰，因此，每當他們的黑色採訪蓬車一抵達戰地，戰士們即知道將會有一場激烈的戰鬥發生(Cutlip, Center, and Broom, 1994；胡光夏，2000)。

基本上，美國內戰就如同英國克里米亞戰爭一樣，開啟了軍隊與媒體間的衝突與不信任歷史。在內戰期間，軍方將領對於媒體是採取敵視的態度。以William T. Sherman將軍為例，他就曾表示：「我討厭報人。他們來到軍營，收集軍營中的謠言，然後就把當它當成事實加以報導。我將他們視為是間諜，事實上，他們就是間諜。如果我將他們全都殺光，在早餐之前，也會有來自地獄的新聞。」

(轉引自<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儘管在內戰中有部份軍事人員認為，由於第一憲法中賦予民眾「知的權利」，因此主張報業應享有自由(Sharkey, 1991)，但由於有些政府官員指責媒體影響軍隊士氣與民意，致使林肯總統下令對全國一些媒體，以違反安全為理由來加以限制。

英國記者Russell也曾參與美國的內戰報導。由於他的客觀報導，使得美國政府部門極為不悅，特別是有關Bull Run戰役的報導，由英國再傳回到美國後，他受到許多的威脅與攻擊，並且還為他特別擬定了損害名譽法條，甚至他被取了

「Bull Run Russell」的綽號（Young and Jesser, 1997, p. 25）。

Russell 在 1862 年離開美國沒有多久後，北軍就正式設立了一套媒體審查機制。北方政府的美國戰時國務卿 Edwin M. Stanton 為未來的新聞管制立下了一些模式，這些包括：在 1862 年刻意在 Harpers Ferry 發佈投降者的新聞、變更北軍在 Petersburg（1864-1865）的死亡人數為 1/3 等。他除了撤銷北方報紙的發行權外，也對於不支持政府的記者加以逮捕，並且威脅要對報紙所有權人實施軍法審判。他甚至發佈一位拒絕交出新聞稿記者的槍決命令（Knightley, 1975; Sims, 1983; Young and Jesser, 1997）。

Stanton 在 1864 年開始發佈每日戰報（war bulletins），表面上是發佈給位於紐約的最高軍事指揮中心，但實際上卻是透過美聯社來發佈（Knightley, 1975; Sims, 1983; Young and Jesser, 1997）。在內戰中，有些軍事指揮官會與記者結盟，給與媒體獨家等方式，來討好媒體，而軍事指揮官所獲得的回報是媒體的吹捧，對於個人前途升遷有很大的助益（Young and Jesser, 1997）。

美國內戰是首個真正透過媒體報導，而獲得國際支持的戰爭（Young and Jesser, 1997）。在內戰中，美國也首次發展出雙重媒體管制系統——新聞審查和接近戰場採訪資格的審核，來限制媒體活動。在內戰中發展出「報業通行證」（press pass）發放，來管制記者接近戰場。另外一種創新的媒體管理方式是「新聞發佈」（press release）（<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這些新發展出來的管制措施，在後來的戰爭中持續不斷的被採用與修正（Hallin, 1997）。

Young and Jesser（1997）就曾指出，美國內戰對媒體的最大影響是，奠定了審查與非直接政治與軍事管制的形式。

## （二）其它戰爭

### 1. 法普戰爭（1870）

1870 年法國與普魯士（德國）間的戰爭中，比較值得注意的事項有三（Young and Jesser, 1997, pp. 26-27）：首先，英國戰地記者 Archibald Forbes 運用電報首創在戰鬥發生 24 小時內將新聞傳送回倫敦總部；其次，一位英國業餘戰地記者 Labouchere 藉由熱氣球從空中來傳送新聞稿；最後，在傳播媒介日漸國際化下，官方的領導人卻公然說謊。

當時的普魯士總理 Bismarck 公開駁斥英國記者 Russell 在訪問王儲中，王儲曾談論到有關普魯士國王與法國拿破崙間會面一事的報導。由於普魯士總理的公開反駁，使得 Russell 在當時遭受到極大的壓力，對於其所建立的報導公正性產生極大的威脅，然而事後卻證明 Russell 的報導是正確的（Young and Jesser, 1997）。

### 2. 蘇丹戰爭（1898）



英國 Kitchener 在 1898 年被派遣到蘇丹，掌管該殖民地。他明瞭媒體的影響力，因此，對媒體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對於跟隨他到殖民地的 26 名記者，嚴格規定每天發送的電報稿不能超過 200 個字。Kitchener 對於記者也相當的鄙視，甚至在某一個場合中，稱記者是「酒醉的無賴」(drunken swabs) (轉引自 Young and Jesser, 1997, p. 27)。

### 3. 波爾戰爭 (1899-1902)

在波爾(Boer)戰爭中，出現了首個政府為了達到宣傳目的所製造的假事件。英國在 1899 年派遣 Redvers Buller 將軍到南非平定波爾共和國。Buller 是英國首位在戰爭中，帶著攝影師到戰場的軍人。在此一戰爭中，有來自英國、美國和歐洲等國的報社記者，最高峰時有 300 名戰地記者 (Young and Jesser, 1997)。

新聞影片 (newsreels) 已初步的研發成功，可以捕捉到動態的影像。而虛假事件正是透過新聞影片來加以呈現。影片中記錄著英國紅十字會 (Red Cross) 在前往醫治受傷病患途中，曾遭到敵軍的意外攻擊。然而事後卻證明，整個事件是在 Hampstead Heath 拍攝，參與的人都是付費的演員，主要是想藉由此一影片，來影響民意對於戰爭的支持 (Young and Jesser, 1997)。

Roberts 在 1900 取代 Buller 將軍後，就定期對媒體實施簡報與發佈公報。他對於記者近用軍方電報也採取嚴格的審查。媒體與戰地記者也被軍方操縱與利用，只有經過指揮官同意的資訊才能發送。

整體而言，英國傳播機構與政府維持著相當良好的關係。以英國路透社為例，在 1861 年已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地方傳送新聞，並且與英國的外交和殖民統治者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Read (1992, p. 40) 曾將路透社形容為是：「大英帝國的一個公共機構」。在波爾戰爭期間，路透社對於英國政府與軍隊政策與決策的支持，在英國的殖民帝國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Thussu, 2000)。

波爾戰爭中所發展出來的新聞管制形式包括：經由傳播工具的管控來執行嚴格的審查、以軍方自己的偏見執行審查與對於不符合軍方期望的媒體記者加以懲處。Young 與 Jesser (1997) 指出，這是在一個主要戰爭中，首次因為軍方的偏見所執行的大規模審查，因而引起媒體的高度關切，使得軍方與媒體間的衝突日漸白熱化。

### 4. 日俄戰爭 (1904-1905)

日俄戰爭爆發後，大約有上百名國外記者等待日本政府的核准，要前往戰地採訪，但日本卻透過簽證核發的手段，阻擾了許多國外媒體記者申請，最後僅有 20 名左右國外媒體記者獲得許可，然而在戰場上卻有許多日本記者。事實上，真正目睹戰爭的外籍記者只有一位義大利記者與兩位新聞通訊社記者 (Young and Jesser, 1997)。

在此一衝突事件中，首次見識到無線電（radio）的價值。倫敦《時報》記者 Lionel James 曾秘密的在其所租用船隻上，裝設無線電發射器，來成功的報導海戰，但據說他是代表日本情報機構，才獲得日本官方的許可。由於 James 對岸上的聯繫仍掌握在日軍手中，當他無法達成日軍目的時，其傳播的通路就立即被切斷（Young and Jesser, 1997）。

在此一戰爭中，除了無線電發送被首次使用外，軍方所學習到的最大經驗是，否決戰地採訪的許可。此外，由於日本所發動的戰爭中，其後方與前線的距離有 150 公里遠，而這對於戰地記者而言，是一種新的挑戰與考驗。後來也激發了新的戰爭新聞報導型式的誕生，也就是從事戰爭分析的記者，在戰場的後方來分析政府政策、以及軍方的戰略與戰術（Young and Jesser, 1997）。

#### 四、總體戰時期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戰爭涉入的衝突規模與影響性超越人類以往的任何戰爭，通常被稱為「大戰」（the Great War）。

由於主要參戰國在宣戰前後，對於媒體都有一些管制的法令與措施，使得一些參戰國媒體要在前線採訪是困難重重。以下分別針對德國、英國、法國與美國加以說明。

##### 1. 德國

德國總理 Bethmann-Hollweg 於 1914 年 7 月 31 日宣佈全國進入「圍困狀態」（a State of Siege）時，為了防止民眾接觸到不可信的消息，同時對媒體發佈了 26 項禁令（Marquis, 1978, pp. 470-471）。德國柏林軍事指揮官 von Kessel 於 8 月 8 日也特別提醒媒體，禁止刊載軍事事務消息（轉引自 Carruthers, 2000, p. 58）。

德國在 1915 年 9 月 7 日設立了「戰爭新聞局」（War Press Office），來從事新聞管理工作（Carruthers, 2000；段慧敏譯，2005）。戰爭新聞局的工作包括：對軍隊發行刊物、舉行定期新聞簡報、對媒體編輯每週舉行 2 或 3 次的會議來進行恐嚇與建議等。

基本上，這些對於媒體的宣告與限制都僅具象徵性意義。因為在實質上，一直到 1921 年為止，德國僅有一家半官方的 Wolff 電報局（Wolff Telegraph Bureau）提供報社電纜服務工作。此外，該局也負責提供較具敏感性的政治消息，而該局在提供前都先交由外交部（Foreign Office）清查。在戰爭期間，德國媒體完全依賴已事先經過審查的 Wolff 電報局提供戰爭訊息，而任何媒體想派遣記者至戰地採訪，都要經由當地軍事指揮部審核（Marquis, 1978）。整體而言，德國國內媒

體大都是採取愛國主義來報導新聞 (Young and Jesser, 1997)。

## 2. 英國

英國戰爭部長 (Minister for War) Arnold-Foster 在 1904 年一項內部戰爭公文的記載中就已經提到，從日俄戰爭中獲得了一些戰時管制的啟發 (Young and Jesser, 1997)。

英國在 1910 年通過了一項「官方機密法」(Official Secret Act)，其中規範了媒體報導不得與公共利益相抵觸。1911 年戰爭部與 5 個媒體代表組成了一個委員會，共同擬定了軍事緊急狀況時期的資訊處理準則 (Rose, 1995)。1912 年成立了「聯合軍事報業委員會」(a Joint Military Press Committee)。

為了避免重蹈克里米亞戰爭中，經由媒體報導而洩露軍情，在 1914 年戰爭爆發後，英國政府隨即成了「戰爭新聞局」(War Press Bureau)，由 F. E. Smith 出任首任局長，後來由 Birkenhead 公爵出任 (Royle, 1989; Young and Jesser, 1997)。

戰爭新聞局設立後，立即採取了兩項主要的措施 (Carruthers, 2000, p. 62)。首先，英政府運用在國際電報議會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Convention) 中的力量，終止經由該國傳送到他國的電報與廣播服務。在此同時，德國橫跨大西洋的電報線纜也被英國加以切斷。至於國內電報傳送與接收的服務仍持續，但需透過戰爭新聞局，並且要承諾所傳送的資訊都是可信賴的 (Haste, 1977)。

其次，在「領土防衛法」(the Defense of Realm Act) 的規範下，廣泛禁止收集與刊載戰爭消息，以及直接或間接傳送有利於敵軍的資訊，如有違反此一法律規範，媒體編輯或記者將可能會送至軍事法庭 (Court Martial) 審判與最高判處終身監禁。一些英國媒體為了避免觸犯該法律，除了來自官方的新聞外，大都會先尋求新聞局的指導，因此，使得新聞局成為新聞媒體的保護盾。在戰爭期間，新聞局也協助軍方發佈新聞，但本身並不採訪戰爭新聞 (Carruthers, 2000)。

至於戰地採訪方面，原蘇丹殖民地統治者 Kitchener 在接任英國軍隊指揮職後，棄置了戰爭局原先擬定的媒體管制計畫，而採取了一貫嚴厲態度來對待媒體記者。他所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追隨法國，禁止媒體記者進入戰場，以致於英國派遣部隊到法國時，沒有一位媒體記者隨行 (Royle, 1989)。Kitchener 並下令如在戰場上發現記者，立即加以逮捕，並取消其護照。從 1914 年 8 月至 1915 年 5 月間，英國所有記者和攝影師全部被禁止進入戰場，凡是違法侵入戰場者，都被視為是外來敵人 (Carruthers, 2000)。儘管如此，還是有漏網的記者，在法國提供英軍剛參戰時的報導，而由於客觀報導英軍的重大傷亡，對於軍隊與民心士氣造成很大的影響 (Young and Jesser, 1997)。

由於嚴格管制媒體採訪，英軍為了向民眾提供戰時資訊，特別任命參戰軍官

Ernest Swinton 上校，來撰寫英軍在法國的參戰情形，提供媒體採用。此外，軍方也出版了一些刊物，以照片、圖畫和地圖，來呈現聯軍的戰果、以及對敵人的宣傳戰，例如，*The Illustrated War News* 與 *The Great War* 等（Young and Jesser, 1997）。這些經過淨化的參戰官兵現場目擊報導，一直持續到 1915 年中，但後來引起媒體與民眾的極大反感。到了 1915 年春季，戰爭部終於准許 4 位記者在軍方的伴隨下前往線採訪。後來逐漸發展成經由官方核准至戰地採訪的機制，且將美國媒體記者也納入（Young and Jesser, 1997; Carruthers, 2000）。

至於對外的宣傳戰，在戰爭爆發後，一直缺乏一個集中事權的宣傳機構。資訊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在 1917 年才成立。該部由《快報》的負責人 Beaverbrook 勳爵擔任，主要是負責所有傳送到外國的資訊（Young and Jesser, 1997; 陳衛星譯，2005）。1918 年成立了敵軍宣傳部（the Department of Enemy Propaganda）（Young and Jesser, 1997）。

英國政府與該國新聞通訊社——路透社，一直採取合作的方式。例如，在 1911 年，英國政府與路透社達成秘密協議，該社負責將英國官方訊息傳送到大英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而各殖民地官方每年必須給付 500 英鎊的酬勞，以作為回報。在第一次大戰期間，路透社與英國外交部合作，提供戰時新聞服務工作。路透社的戰時執行主管 George Jones 曾被徵召同時主管英國政府的資訊部，掌管戰時的宣傳工作（Thussu, 2000）。因此，雖然路透社是以一個獨立與公正的新聞通訊社來運作，但卻巧妙地成為政府戰時宣傳的工具與手段（Read, 1992）。

Young 與 Jesser（1997, p. 33）指出，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氣氛下，這些對於媒體的管制是沒有不要的，因為大部份英國媒體都以愛國主義的立場與責任感，完全支持政府的戰爭目標。當時英國首相 Lloyd George 在 1916 年就曾說過：「英國新聞界填補了本來應該由國會行使的職能，在法國是由國會完成的。」因此，可以說，英國媒體從戰爭一開始就扮演著動員國家參戰與作為一個宣傳機構的角色（轉引自陳衛星譯，2005，頁 61）。

### 3. 法國

法國在 1914 年 7 月 30 日，就已經對電報訊息進行審查，並且禁止城市間的電話聯繫。8 月 2 日起，因為全國已頒布戒嚴令，軍方部門有權終止或禁止所有刊物出版。8 月 3 日起，隸屬於陸軍部的「新聞辦公室」負責審查所有軍事訊息。8 月 5 日，《戰爭期間制止新聞洩密法》明確規定「動員、部隊運輸、兵員數量、裝備、口令、死傷數量、部隊換防、人員任命和所有評論軍事行動或在外交性質上有利於敵人，或對部隊和民眾的精神狀態產生不合適的影響的訊息和文章」都屬於政府和軍事指揮部的資訊管制範圍（陳衛星譯，2005，頁 62；段慧敏譯，2005）。

法國政府在 1915 年創設了一個新聞科，由 Andre Tardieu 負責，他除了籌劃《前線生活評論》專欄，來從事宣傳工作外，每天也傳送三次簡報，提供法國媒體採用。1916 年 6 月法國成立了一個紙張分配的政府部門委員會，來管制報紙發行張數與售價（陳衛星譯，2005）。

陸軍部則設立了新聞出版署，下設三個部門：日報部、期刊部與電報部，並且採用一種雙重審查系統，即軍方審查與民事審查，巴黎審查與外省審查同步進行（段慧敏譯，2005）。此外，法軍也派遣軍事通訊員，提供戰時資訊（陳衛星譯，2005）。

#### 4. 美國

在國會正式宣戰前，Woodrow Wilson 總統就已先成立了一個「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成員包括海軍與陸軍部長、國務卿和前報人 Georges Creel。該委員會後來被稱為 Creel 委員會，其職責是動員美國媒體向公眾銷售戰爭與壓制和平主義者的保守意見，以及要求報紙不要刊載軍方的部署、調動與防衛攻勢等訊息，以確保軍事機密與軍事行動安全。公共資訊委員會的另一重要職責是，透過資訊發佈，來使國內民眾支持戰爭。在戰爭期間，該委員會總計發佈超過 6 千則新聞稿（<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該委員會不僅代表美國官方宣傳機構，也是第一個政府檢查機構（陳衛星譯，2005）。《民意》一書的作者 Walter Lippmann 在戰爭期間，曾在此一機構服務過（Bennett and Paletz, 1994）。戰後，Creel 委員會就被解散了。

有兩個法令強化了公共資訊委員會的權力，即 1917 年「間諜法」（Espionage Act）與 1918 年「煽動法」（Sedition Act）。

「間諜法」中限制媒體刊載直接與間接有利於敵軍的資訊，同時也規範了不能干擾軍方軍事行動或戰時生產。該法案中有一條文，明定對於「不忠誠」的報紙，郵政系統不能加以遞送。由於該法並沒有訂定不忠誠的明確判準，因此，全憑主事者自由心證。當時的郵政總局長 Albert S. Burleson 在參戰的第一年，曾逕自決定取消了 44 個報紙的郵遞傳送服務，而這些報紙大都是德文或社會主義的報紙（<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煽動法」於 1918 年 5 月 16 日由美國國會通過，主要是為了制止所有針對政府政策的批評。該法將寫作或出版任何不忠於、褻瀆或辱罵美國政府、憲法、軍隊、國旗或軍服等言語，視為是一種罪行（陳衛星，2005；<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美國允許記者前往線採訪，但必須要先獲得政府核准，且要遵守嚴格的規範。報紙不僅要保證該報記者是一位媒體紳士（a gentleman of the press），且強

制要購買 1 萬元戰爭債券作為背書。至於戰地攝影，只有獲得戰爭部（War Department）許可的人，才可以在戰地拍攝。戰爭部同時特別要求派往法國採訪的媒體通訊員必須將其所撰寫的通訊稿交付軍方審查員審查（Cate, 1998）。

從 1914 來以後，美國政府在戰時的所有說服活動的目標，是透過建立的機制來操縱資訊，並透過媒體來維繫民眾對於戰爭的支持（Sanders and Taylor, 1982）。在屬於第一個總體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前線與後方的鴻溝非常的小，媒體的關係被細心的加以經營，因而變成是現代軍隊與媒體關係的一個典範。新聞記者被安置在遠離戰地的碉堡中，而新式的默片攝影機也無法接近到有傷亡正在發生的地方（Taylor, 200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可以觀察到五個重要的傳播現象，對於日後的戰爭新聞管理與戰爭報導有著重大影響。

第一、此一戰爭可能是歷史上首次藉由媒體來進行大規模國際輿論戰的戰爭。英國與德國分別為了讓美國參戰或保持中立立場，在海外的媒體上展開相互的攻擊，但最後卻是英國成功地讓美國捲入這場戰爭（Young and Jesser, 1997）。

第二、在戰爭期間，已出現將敵人妖魔化的攻勢宣傳作為，主要是藉由媒體報導殘暴故事，來增加民眾對敵人的仇恨，但事實上，這些媒體報導的故事，在後來都不是事實（Young and Jesser, 1997）。

第三、為了阻止敵軍對外通訊，會切斷其對外的傳播通道。英國為了阻止德國通訊，在 1914 年 8 月 5 日將德國大西洋的電報線切斷，使得要傳遞到美國的訊息都要繞經英國，且經過審查與編輯後，才能收到相關的新聞（<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第四、在大戰期間，參戰國媒體大都堅守愛國主義的原則，來進行自我審查，再加上政府的管制與審查，使得許多戰時真相並沒有在媒體上呈現。例如，在 Paschaendale 的一小時交戰中，據估計有 500 萬法國人、6 萬英國人與 300 萬德國人喪命，然而各國媒體都沒有具體的報導（Young and Jesser, 1997, p. 34）。就如當時英國首相 Lloyd George 在 1917 年 12 月表示：「如果讓民眾知道真相，戰爭隔天就會停止。但是民眾當然不知道，也不能讓他們知道。戰地記者不會去寫，而審查者也不會讓這個真相傳遞出去。」（轉引自 Young and Jesser, 1997, pp. 34-35）。

第五、許多國家對於軍事採訪禁止報導事項，已逐漸發展出明確的判準。以美國為例，對於軍事行動採訪限制的列舉項目包括：不得曝露軍隊與武器的位置、軍方擬定戰術的討論、失蹤而等待救援的部隊與飛機和船艦的位置、以及可能會被敵方利用的軍事行動弱點等（Woodward, 1993）。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標誌著廣播新聞學的年代，也被稱為「廣播戰爭」（胡光夏，

2005；段慧敏譯，2005）。廣播戰爭有兩種意涵，即廣播作為報導戰爭的傳播媒介與作為戰爭工具的傳播媒介。

首先，廣播已成為報導戰爭訊息的主要媒介之一，民眾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僅依賴報紙與新聞影片（newsreels）。廣播提供了戰況的即時報導，民眾可以第一手聽到英國倫敦被德軍轟炸、羅斯福總統的爐邊廣播談話、德國投降與杜魯門總統宣布危機已解除等訊息。

其次，廣播媒體被用來在戰爭中進行宣傳戰與心理戰的工具。就如同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貝爾（Joseph Goebbels）在談到國際廣播時，曾稱之為「無疆界的媒介」（limitless medium），並視之為一種國際外交、說服，甚至是脅迫敵人的主要工具（Hachten, 1992；胡光夏，2005）。

英國在 1935 年即預見到戰爭可能隨時會爆發，因此計畫在大英帝國國防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下設立一個次級委員會，來管制戰時的資訊流通。在 1939 年宣戰的前二天，成立了資訊部，員工有將近 1000 名。在「緊急權力法」（the Emergency Powers Act）下，資訊部被賦予無限的權力，來審查經由英國傳送的任何新聞、商業或私人訊息的信件、電纜、無線或電話等。在此一法令下，所有的人（包括媒體記者）都禁止收集、記錄和傳送有利於敵人的消息（Young and Jesser, 1997; Knightley, 1975）。

當時的英國首相 Churchill，儘管有新聞記者的背景，但對於媒體仍有安全的顧慮，他常不經過媒體，就直接向全國民眾廣播或者向國會報告（Young and Jesser, 1997）。

德國對於媒體則有著更好的準備，非常重視媒體在宣傳戰上的影響力。至於另一參戰國蘇聯，則較少有相關這方面的探討（Young and Jesser, 1997）。

至於美國，「間諜法」與「與敵人貿易法」等仍存在。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設立了「戰爭資訊局」（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與「審查局」（the Office of Censorship）。戰爭資訊局如同國家戰爭新聞的編輯台，所有關戰爭新聞的發佈都要透過此一機構的新聞部門。其中審查局是以民間企業的方式成立，人員有 14462 人，負責美國與其它國家間信件、電纜與廣播等的審查工作（<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由於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對違反規定的記者和報紙的嚴格檢查已達到嚴苛的地步，在戰後，「間諜法」與「煽動法」成為眾矢之的，致使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在資訊的管制上採取較為溫和的管制措施（陳衛星，2005）。美國政府於 1942 年 1 月 15 日制訂了「美國新聞業戰時運作守則」（Code of Wartime Practices for the American Press）。此一守則明訂了處理戰爭新聞的正確方式，後來成為如何與報導何種戰爭新聞的準則。此一守則並沒有強制力，而是由美國新聞媒體

組織自行採納。基本上，政府是依賴記者的愛國心，期望媒體記者能自制，自動遵行戰爭資訊局所頒布的規範（<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對於記者前往戰地是採取許可制，來管制新聞媒體。在此一許可制下，記者前往戰地採訪需要兩種證件，一是由國務院核發的護照，另外則是戰爭部所發的媒體通行證（press pass）。美軍總計核准超過了1600名記者前往戰地採訪。幾乎每一個戰場都有美國的戰地記者，不管是在飛機、船艦或沙灘上（<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美軍持續對戰爭新聞的報導進行審查工作，但由於放寬媒體戰地採訪，因此，軍方與媒體雖然為了新聞採訪，仍有些許的衝突存在，但彼此對雙方的關係都還算滿意（Mott, 1966; Cate, 1998）。

Hallin（1997, pp. 208-209）曾歸納出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時期，軍隊與媒體關係具有三項特色：

第一、民意管理所發展出來的策略是為了有正面的民意評價，因此，比較強調公眾宣傳而不是管制；

第二、戰爭期間國家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關係，不只是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壓抑，也包含合作關係，因此，兩者間的界線是模糊的，而國家的某些功能也常被其它機制，如媒體等所取代，反之亦相同<sup>6</sup>；

第三、這些媒體報導戰爭的方式也逐漸發展成依賴官方消息為主要來源，變成以官方的觀點來報導消息。

## 五、全國媒體聯合採訪制與嵌入式隨軍採訪（embedded journalist）的萌芽與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進入了冷戰時期，在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陣營的對抗下，國際情勢詭譎多變，所爆發戰爭的特色是屬於局部戰爭。

戰後，美國崛起，成為自由世界的主要領導者。在美國領導下對抗共產集團的戰爭中，在亞洲以韓戰與越戰最受到矚目。韓戰是美國所參與的主要衝突中，最後一個以平面媒體與廣播為主要報導的衝突事件。越戰則是觸動美軍進行軍隊與媒體關係革新的因素。

---

<sup>6</sup> 例如，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設立的管制室（The Office of Censorship）是由一位新聞記者擔任主管，主要是仰賴媒體自願性的合作。而政府的有些安排也影響到娛樂媒體的角色（Hallin, 1997, p. 209）。



英國與阿根廷間所爆發的福克蘭戰爭則是美國汲取發展新媒體管制體系的泉源。之後，在一連串的戰爭中不斷的進行媒體管制試驗，在 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全面採用全國媒體聯合採訪系統，而 2003 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則發展出媒體記者嵌入制。

### (一) 韓戰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間與媒體相處的成功經驗，美軍在韓戰爆發初期，MacArthur 將軍建立了一個以媒體自制為主的規範體系，給予傳播媒體相當大的自由採訪權，僅發佈一些新聞採訪準則，期望媒體能遵守，並未設立特定單位和人員，來進行新聞的審查與管制工作。另外一個原因是，韓戰從未正式宣佈開戰，因此，缺乏法律的基礎來從事管制。軍方只能要求媒體採取自制的方式（<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然而軍方與媒體在韓戰的良好互動關係僅維繫到中共參戰前（Cate, 1998）。

中共參戰後，由於美軍未能明確發佈正確的準則，來律定那些消息的發佈是適當或是不適當的，導致媒體曝露了不少機密的戰情資料給敵人。在幾位記者因為違反規定遭受到懲處後，媒體記者仍不知道明確的界線，因此，「海外媒體俱樂部」（The Overseas Press Club）的成員最終要求國防部草擬審查指引，以利媒體遵行（<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後來，軍方也體認到新聞管制的必要，因此，設立了一些安全管制分支機構。

1951 年 1 月起，軍隊開始進行對戰地記者的管制，記者在發送新聞與照片、以及廣播前，都要先做安全審查。軍方發佈了行為準則，界定何種是可以接受的報導。違犯規定的媒體記者可能會遭到停止採訪權、逐出戰場與軍法審判等懲處（<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但美國傳播媒體對這些分支機構的管制並未認真看待，媒體記者大都等到離開戰區後，從別的國家將新聞稿傳送回國。儘管如此，韓戰期間，媒體對戰爭的態度與立場大致上是與軍方相同的（Cate, 1998）。因此，美國參與韓戰雖不怎麼獲得民意的支持，但軍方並未怪罪媒體。

### (二) 越戰 (1964-1975)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電視已極為普及，作家 Michael Avlen 將民眾接收媒體戰爭報導的現象稱為是「客廳的戰爭」(The living room war) (轉引自 <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越戰是史上第一個透過電視媒體報導的戰爭（Hallin, 1997），也是美國軍隊與媒體間衝突與不信任的轉捩點（Sharkey, 1991）。

在越戰初期，Johnson 政府極力避免讓參戰消蝕國內其它的政治優先事項，再加上，美國政府是基於回復越南的民主自由，來進行這一場戰爭，因此，對於

媒體與軍隊、以及媒體與政府關係產生兩項重大的影響：首先、對媒體的戰爭採訪採取較寬鬆的政策，並未將審查系統加以制度化，記者只要同意遵守確保軍事安全的原則即可。因此，越戰是美國媒體首次獲准隨軍採訪而又未被嚴格審查的第一個軍事行動，後來被稱為是「未受審查的戰爭」（the uncensored war）（Hallin, 1986; Woodward, 1993; Young and Jesser, 1997; Taylor, 2003）。其次、由於未達成政治共識，因此媒體報導變成多元化，也就是媒體不再像第二次大戰期間是屬於全面戰爭的一部份，而是由媒體自行依照政治新聞報導的原則來報導戰爭新聞（Hallin, 1997）。

越戰初期，美軍為了營造良好的民意與維繫良好的媒體關係，僅對媒體提供自發性的遵守原則，而沒有設立實質的管制體系。此外，美軍採取較主動的媒體公共關係取向，由在越南西貢的國防部官員每天下午五點定時舉行背景說明會，提供媒體相關戰爭的消息。雖然美軍方所主動發佈的消息大都是樂觀面，且與媒體記者所見所聞有所出入，但其國內傳播媒體大都予以配合報導。

越戰是被歸類為是一個「開放性的衝突」（open conflict）。越戰絕大部分是屬於游擊戰，也就是四處都是戰場，換句話說，當記者抵達西貢時，就已經身處於戰場中了（Shaw and Martin, 1993）。

比起過去的戰爭，越戰戰地記者更容易前往戰場採訪。記者只要持有有效的護照、注射證明與媒體的一封信，就可以獲准採訪，使得戰場上，隨處可見到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記者在戰地的採訪通常都由軍方提供交通工具，許多的記者都在清晨搭機飛到戰場，採訪到新聞後，於夜間再飛回到南越首都西貢來傳送新聞（<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軍方對於媒體採取極為寬鬆的開放立場，在北越利用 Tet 假日違反停火協定進行攻擊後，才開始轉變。隨著媒體大量報導美軍傷亡的消息，特別是透過電視媒體的報導，活生生的將戰爭畫面帶到美國民眾家中，間接促成美國國內反戰活動的盛行。保守人士指責媒體是戰爭的惡棍，造成民心瓦解，導致作戰失敗，而自由派人士則讚美媒體是英雄，報導政府對民眾隱瞞真相的企圖與方式（Hallin, 1997）。而軍方則開始責怪媒體未對前線加以支持，並將媒體視為是戰爭勝利的破壞者（Cate, 1998）。後來軍方逐漸形成共識，將越戰失敗的原因歸之於當時的電視媒體報導。因而有「戰爭加上生動的電視報導就是等於失敗」之類的看法（Carruthers, 2000, p. 146）。而這也埋下了軍方尋求在未來軍事行動中有效規範媒體的想法與作為，以及使得戰爭在實質上逐漸變成「媒介化」（media-ized）和「公關化」（PR-ized）（Young and Jesser, 1997; Louw, 2001, p. 174）。

美軍從越戰中所獲得的啟發主要有二：首先，如果在己方的反戰意識日漸高漲，就會帶來要終止戰爭的政治壓力，而戰爭也就會失敗。其次，電視的影像有

能力來提升反戰的意識，以及干擾合法武力的使用，甚至是政府的正當性。電視的立即性會帶給閱聽眾負面的印象與情緒（MacArthur, 1992, p. 82）。此後，美軍對於電視對發動戰爭的影響的關切日益成長（Louw, 2003），而在後來美國所介入的每一個衝突中，包括：Grenada（1983）、Panama（1989）、Persian Gulf（1990）、Somalia（1992-1993）、Haiti（1994）、Bosnia（1992-1995）、Kosovo（1999）、Timor（1999）與 Afghanistan（2001）等，都可以見到政府與軍方靈巧的運用媒體（特別是電視）作為一種強而有力的戰爭工具（Louw, 2003）。

一些美國學者的研究卻指出，將戰爭失敗歸究媒體報導的聯想，缺乏明顯的證據（Schudson, 1995; Hallin, 1989）。Hallin（1986, p. 213）認為，將戰爭的失敗歸咎於電視是過度的簡化。Hoskins（2004, p. 18）對於越戰期間的新聞報導，被指控為是殘忍和負面，也提出質疑，認為「僅有少數的電視新聞影片在衝突期間，呈現真正的戰鬥和傷亡的場景。」他認為，電視的角色使美國在越戰中失敗的神話，會一再的盛傳，是因為在記錄影片和電影中的不斷重複所造成的。

### （三）聯合採訪制的萌芽與應用

#### 1. 英阿福克蘭戰爭（1982年）

儘管在英阿福克蘭戰爭前，電視已非常普及，但此一戰爭不僅不是一場電視的戰爭，甚至也說不上新聞照片的戰爭。20世紀的新傳播科技在這一場戰爭的採訪中都沒有發揮的餘地。戰爭新聞傳送的速度甚至比1884年William Russell的年代還要慢（Carruthers, 2000）。

英阿福克蘭戰爭由於戰場距離英國遙遠，限制了媒體接近戰場，因此，有利於軍方對資訊的管制。英國政府官員也深信，國內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並不是在提供有關軍事衝突的獨立、公正的資訊，而是在國家危機時，能協助引導和穩定民意對政府的支持（Sharkey, 1991）。

英國在福克蘭戰爭中所引用的媒介資訊管理系統是來自於美國在越戰中的教訓（Carruthers, 2000; Hila and Hila, 2004）。儘管Morrison與Tumber（1988）曾批評說，英國政府與軍隊在福克蘭戰役期間所採取的資訊政策，是缺乏組織性和計畫性，既沒有一致性的判準，也沒有管制中心與部門間的協商系統，只是藉用「軍事安全」的理由，來延遲或審查資訊的採訪與散發假資訊，但由於成功的管制戰爭新聞，後來成為美國學習的榜樣。

英國在此一戰役中所採取的新聞管制作為主要有二：挑選新聞採訪團隊與傳送方式的控管（Carruthers, 2000）。首先，隨軍採訪的記者群中，除了一位英國路透社記者來服務國際媒體外，其餘全部都是英國的媒體記者，總計有29位英國記者搭乘3艘不同的船艦隨英軍特遣隊採訪。其次，在特遣隊航行的三天途中，英軍指揮官完全禁止媒體記者採用無線電波傳送訊息。之後雖同意傳送，但

都必須經由個別艦長的同意才能將訊息傳送回英國倫敦。

## 2. 格瑞納達戰役 (1983 年)

越戰後，美軍即針對與媒體關係展開檢討，並研擬限制媒體記者直接至戰場採訪的可能措施。而英國在 1982 年英阿福克蘭戰爭中的資訊管制措施，由於限制媒體的採訪，並迅速的打贏戰爭，贏得廣大民意的支持，成為美國最佳的模仿榜樣 (Sharkey, 1991; Hiebert, 1995; 胡光夏, 2003a)。

1983 年美國入侵格瑞納達 (Grenada) (代號為 Operation Urgent Fury) 時，對媒體採取保密與嚴格的管制措施。在此一戰爭中，媒體完全被排除在外，一直等到雷根總統宣佈軍事行動成功後，媒體才獲知消息，並由國防部同意前往採訪，但前往採訪的媒體被要求在發佈新聞稿前要接受逐一的審查。因此，對軍方而言，格瑞納達是一項成功的軍事行動，卻是新聞記者的災難 (Williams, 1995)。美軍在此一戰爭中，也首次採用電子干擾來阻止替代性的傳播管道 (Young and Jesser, 1997)。

美國媒體認為，國防部在 Grenada 的資訊管制作為，是對公眾的一種隱瞞，且不尊重憲法所賦予人民知的權利，因此，持續向政府最高階層抗議。而為了促使軍方在未來的軍事行動中與媒體的互動關係能改善，並研擬彼此可接受的具體可行方案，雷根政府後來同意由參謀聯席會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成立 Sidle 委員會，此委員會成員包括 14 位新聞記者和媒體公關人員 (Cate, 1998; 胡光夏, 2003a)。Sidle 委員會在經過研議後，總計提出了八項促進未來軍方與媒體互動的具體方案<sup>7</sup>。此外，此委員會也建議軍方採取一些具體作為來增進與媒體間的互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軍事行動中設立「全國媒體聯合採訪」(National Media Pool)，以因應媒體無法自由接近戰場採訪新聞的情形 (Cate, 1998; 胡光夏, 2003a)。

基本上，在雷根政府時代對政府資訊的管制都採取較嚴密的作為，為防止政府資料外洩，雷根政府主張對涉嫌提供資料給媒體的官員實施測謊，並要求做官員的安全查核以及簽署終生不得洩露的切結 (Sharkey, 1991)。

## 3. 巴拿馬戰爭 (1989 年)

入侵巴拿馬 (Panama) 是美軍第一次運用「全國媒體聯合採訪」制。由於媒體聯合採訪小組的成立，使得媒體記者得以在戰爭爆發的數小時內即接獲通知，但美軍似乎是有意或無意的阻礙媒體採訪，媒體記者仍有數天之久無法到達戰場，而在獲核准後，軍方又未能適時提供媒體記者至戰場所需的運輸工具。而軍方認為，媒體派遣到戰地的記者本身缺乏報導軍事行動的經驗。因此，在此一

---

<sup>7</sup> 包括軍方應在未來的任何軍事行動中將媒體涵蓋在內、媒體記者至戰地採訪的資格認定原則、提供記者在戰地採訪的裝備以及運輸工具等

新回合的媒體與軍隊的互動關係中仍搖擺不定 (Cate, 1998; 胡光夏, 2003a)。

#### 4. 阿富汗戰爭 (2001 年)

在 2001 年美國入侵阿富汗期間，許多美國媒體編輯、主管與記者都認為，國防部的管制是比以前來得嚴格 (Hickey, 2002)。媒體的主要抱怨是無法接觸到戰地，因為當時許多攻擊是從海上起飛的飛機，來進行空襲塔利班政府的軍事基地。美國國防部也對於接近戰地和資訊加以限制。

有鑑於美國國防部對於阿富汗戰爭的媒體管制過嚴，*Hustler*雜誌的擁有者 Larry Flint 曾向法院提出對美國國防部長 Donald Rumsfeld 與國防部的訴訟 (Hila and Hila, 2004)。

#### (四) 1991 年波斯灣戰爭的聯合採訪制

波斯灣戰爭的「沙漠風暴」軍事行動是「全國媒體聯合採訪」系統的第二次運用 (胡光夏, 2003a)。伊拉克軍隊於 1990 年 8 月 2 日入侵科威特時，並沒有美國或是國際媒體的記者在當地採訪，一直到 8 月 17 日美國在沙烏地阿拉伯佈署自越戰後的最大規模軍隊後，「全國媒體聯合採訪」才啟動。同年 12 月已有 800 多名媒體工作者抵達戰地，而據統計，整個波斯灣戰爭期間有 1400 名的記者、編輯、製片、攝影師和技術人員等註冊加入在德黑蘭和利雅德的聯合新聞局 (The Joint Information Bureau) (Williams, 1995)。在前五週的空戰中，有將近 1000 名記者是在沙烏地阿拉伯來報導戰爭，其中大約只有 126 名左右的記者獲准參加集體採訪 (Woodward, 1993)。

基本上，波斯灣戰爭是美國在越戰後，首次建立機制化新聞審查機制的戰爭。而全國媒體聯合採訪系統的成立，使得軍方得以限制新聞記者的移動與接近戰場，再加上沙漠風暴行動剛開始主要是以空戰為主，戰爭的本質限制了媒體接近戰場，也有利於軍方對資訊的管制 (MacArthur, 1993; Hallin, 1997)。Keeble (1997, 81-96, 93-107) 認為，媒體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中為政策目的服務的方式有二：首先，在報導中要將歷史加以排除<sup>8</sup>；其次，只選擇軍方的陳述作為政策的辯論。

聯軍在 1990 年 8 月就已經決定要將國際媒體組織組成集體採訪制 (MacArthur, 1993)。此一系統區分為兩層，一層只能被告知，另一層則有機會目睹戰況。最幸運的一層是加入媒體報導隊伍 (the media reporting teams, MRTs)。在美軍公共事務軍官 (public affairs officers, PAOs) 或英軍公共關係軍官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PROs) 的嚴密監督下，這一群人被允許可以接近駐紮在前線的部隊。只有對聯軍有較大貢獻的美英法等國的媒體組織，可以分配到

---

<sup>8</sup> 是指要刪除有關越戰失敗的歷史記憶。

這 200 個位置 (Carruthers, 2000)。其它國家的媒體或者是比較不幸運的美英法等國媒體，則被分配到第二層。這些「旅館戰士」(hotel warriors)新聞記者住在豪華的利亞德飯店或者是聯軍指揮中心的德黑蘭，可以參與由聯軍公共事務人員每天所舉行的數次新聞簡報。

一些學者 (如 Luostarinen, 1992；臧國仁，1999) 指出，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美軍主要是採取三種方法來管制媒體：餵食、競爭與限制。

Gerbner (1992, pp. 247-248) 歸納出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中，美國政府與軍方對於「瞬間歷史」(instant history)的成功危機管理策略有五種：控制、協同、目睹、回饋和迅速的凍結。

第一、獲得近用和管制第一時間的全球影像。

第二、將軍事行動與主流媒體事件與其它的符碼等相結合。

第三、提供閱聽眾在現場目睹的感覺，包括一些看似偶發，但是經由策劃的場合，如記者會、小組討論會、簡報和說明等。

第四、將目睹與參與轉換成支持的具體回應，如民調、讀者投書、打開行進中的車燈和按喇叭等。

第五、歡慶快樂的結束。迅速地產製和傳送錄影帶、CD-ROM、書與各式各樣的文本，來充斥市場，以作為緬懷和學校使用。

另外一位學者 Nohrstedt (1992, pp. 119-120) 則歸納出，在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中，對於新聞記者的限制主要有四種：簽證阻擾、集體採訪制的納入與排除、軍方人員扮隨與懲罰違犯規定者。

O'Hefferman (1994, p. 242) 分析美國媒體的管理者的策略有五個：

第一、阻擾全國性的媒體來檢視政策的基礎或者是不加以談論。

第二、主動發佈給電視網強而有力的電視影像畫面，如精密導彈的影帶或是愛國飛彈成功攔截飛毛腿飛彈的畫面等。

第三、向媒體記者提供大量的新聞簡報與背景資料，使記者無法吸收處理。

第四、指派人員做資訊流通的管制，防止洩密，而這些同樣地也是由戰時資訊局與戰地指揮中心負責。

第五、拒絕透過正常的新聞發佈管道提供深入的資訊，因為媒體管理者瞭解到，只有少部分有時間、經驗和經費的記者，才能深入挖掘到相關新聞。

在波斯灣戰爭中，美軍啟用「全國媒體聯合採訪」系統來管制媒體接近戰場，雖然美國民眾似乎對軍方所提供的消息感到滿意，但許多的媒體除抗議管制接近戰地作法的不當外，並指控軍方的新聞審查是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且批評軍方常為了公關而非軍事安全的理由更改新聞稿。在戰後，美國的 *The Nation* 雜誌甚至正式控告國防部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 (Cate, 1998)。

美國《華盛頓郵報》國際版編輯 Getler (1991) 曾說，1991 年波斯灣戰爭是現代「最徹底與精緻」對記者加以管制的戰爭，其整體控制的程度超越以往的任何一個戰爭。例如，一位英國電視台記者在戰地想要與倫敦聯絡，其電話通訊被美國的 AWACS 飛機攔截到 (Luostarinen, 1992)。

當美國國防部發言人 Pete Williams 在戰後愉快的宣布，集體採訪制給予美國人民前所未有的戰爭報導之際，有些批評家就指出，這些電視報導只是「國防部的電視」(Pentavision) (MacArthur, 1993, p. 16)。有批評家就指出，「看得愈多，就會變得愈愚蠢。」(Cumings, 1992, p. 117; Morgan, Lewis and Jhally, 1992, pp. 216-233)。

在沙漠風暴期間，英國 BBC 特派記者 Bell (1995, p. 12) 就指出，英軍是採用一種新的方式來與媒體打交道：

此種新的方式不僅允許記者在一種審查的體系下，以受到控制下充分的接近戰場，且邀請記者與前線的兵士共同體會危險與艱困，而在此種情形下，記者就會與軍隊站在同一陣線。這種過程就叫做綁在一起，是一項不尋常的軍事計畫，而確實發揮功效。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1991, p. A16) 也撰文批評，指出「集體採訪制是無法運作的。新聞和照片不是延遲，就是消失了。要接近到官兵都要經過實際上並不需要的軍隊伴隨與審查。在波斯灣戰期間所實施的集體採訪制，不是在協助新聞的採訪報導，而是在控制。」

Knightley (1992) 指出，1991 年波斯灣戰爭的特色是：英國政府在 1856 年發展出軍方對於媒體的箝制<sup>9</sup>以來，新聞管理主要兩個目的（阻絕有利於向敵方的情報、以及創造和維繫民眾的支持）外，加入了致力於改變民眾對於戰爭本質認知的元素，說服民眾新科技已移除了許多戰爭的恐怖。

總結，美國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管制策略主要是將福克蘭戰爭、格瑞納達與巴拿入侵所建立的型式，加以更精緻化，主要的管制模式包括：秘密的計畫、將敵人妖魔化、塑造國內與國際媒體輿論的支持、在初步的行動階段將媒體排除在外等 (Young and Jesser, 1997; 胡光夏, 2003b)。

#### (五) 2003 年波斯灣戰爭的記者嵌入制

美英等國基於在 1991 年波灣戰爭中，限制記者採訪的相關作為，在戰後招致媒體強烈的批評。因此，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特別允許近 600 名本國與

---

<sup>9</sup> 爲了抑制對於克里米亞戰爭的批評

國際媒體記者隨軍採訪（胡光夏，2003b）。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軍記者的功能是在向國民報導例行的戰況，而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嵌入制」則是美國政府在爭取世界輿論日漸重要的背景下，現代政府公共關係和軍事心理戰中的一次技術的大躍進。「嵌入制」意謂著要贏取輿論的戰略，不再採取攔堵消息的方式，而是採取「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式，來影響媒體，在表面上與形式上是雙方互利，但卻能夠達到透過媒體來進行「議題設定」的功能（張巨岩，2004，頁76）。

美國公共電視節目的特派員和資深製作人 Smith（2003）指出，記者嵌入制使得一種臨近、立即、吸納和著迷的報導形式變得可能，這是前所未見的。

由於新聞媒體組織在不同衝突中所採用的傳播科技不斷的變化與創新，使得軍隊與媒體關係必須要加以重新的審視。Hila and Hila（2004, p. 4）指出，就是因為傳播科技的發展與新聞產業間的激烈競爭，使得美國國防部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中，採取要將新聞記者嵌入的策略。

美國國防部對於參加嵌入制的記者要求要與美軍簽下生死狀，其內容要點有四（張巨岩，2004，頁54）：

第一、美國國防部相信，嵌入對政府和媒體機構是互利的。要求媒體記者必須在所嵌入的軍事單位內生活、旅行、吃飯與睡覺，並進行所有的專業與個人活動。

第二、媒體人員同意參與嵌入，並同意遵照政府相關的嵌入指示與命令，如對指示與命令或管理有任何的違背，都可能使嵌入終止。

第三、媒體人員應瞭解到並認可，嵌入會使他們置於危險的地帶中，其中包括不可測的戰爭風險與作戰行動所帶來的危害，而美國政府對媒體人員的任何損失不負任何責任，媒體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對政府提出賠償要求或提出訴訟。

第四、政府可以在隨時以任何理由終止嵌入。

在2003年3月底，有許多參與嵌入制的媒體記者離開了原來的配屬單位，其理由包括安全考量，以及關切無法從其所配屬的單位獲取足夠的新聞等因素。有一些想要離開，但由於一旦離開不能再補派人選，因此就仍舊待在原配屬的單位（Tumber and Palmer, 2004）。

## 六、結論

本研究採歷史與文獻分析法，檢視人類有文字記載戰爭報導以來，軍隊與媒體間的互動關係。



從研究中可以發現，隨著戰爭型態的演變與媒體傳播科技的發展，軍隊與媒體關係呈現著忽緊忽鬆的現象。現代報紙的出現，再加上傳送訊息的速度與採訪設備的更新，使得軍隊對於媒體是否會影響民意或者是洩露軍事機密的疑慮開始加深，也逐漸孕育出對於媒體加以管制的思維與策略，而這一切都是從克里米亞戰爭開始。

在屬於殖民地戰爭或總體戰爭時期，不同國家在戰時都會制訂相關的法令，對於戰爭相關資訊的蒐集與報導，加以限制。一些機制性的媒體管理機構（如戰爭新聞局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開始有系統的設立，對於媒體報導的內容實施審查，並且採取限制接近戰場等措施，來管制媒體。基本上，在總體戰期間，各國媒體大都會採取自制方式，扮演戰爭的啦啦隊，或作為政府與軍方動員民眾參戰的工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開始進入冷戰時期，由美國所領導的自由民主陣營與蘇聯所領導的共產陣營，展開對峙。越戰改變了美國政府與軍隊與媒體的互動。電視所呈現的戰場景像，被認為是鼓動民意反戰，而導致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越戰後，美軍開始思索媒體管制的策略，並進行一系列的軍隊公共事務改革。英國在福克蘭戰爭中的管制，帶給了美軍相當大的啟發，後來發展成媒體集體採訪制與嵌入制，在與媒體互動的策略上日益的精緻化與公關化。事實上，英國在福克蘭戰爭中的媒體管制構想也受到美國越戰的啟發。由此可見，對於西方現代的媒體管制思維與策略的探討，必須要從歷史的角度來加以檢視，才能瞭解到其發展的脈絡與思維。

對於媒體組織而言，戰爭是人類衝突的極致，本身即具有高度的新聞價值，然而，當己國參戰時，要維持公正、客觀與獨立的報導，似乎是緣木求魚。但戰爭類型的改變，當全民不再被動員參戰，且媒體日漸全球化下，民眾所扮演的是透過媒體來「目睹參與」戰爭。此時，媒體的戰爭報導對於輿論的動向，會有較大的影響，而對於戰爭的發動者而言，民眾「感知的管理」就變得愈來愈重要。因此，有能力發動資訊戰的國家，就採取速戰速決的方式，來介入國際的衝突，而對於媒體的管理也日益的成熟與精練。從早期限制接近戰場、傳送工具的管制、法令的懲處等強硬媒體管理策略，逐漸成為納入與融入的柔性管制方式。由於國際網路在2003年波斯灣戰爭中，已逐漸成為民眾獲知戰爭消息的重要來源管道之一，對於此一新興媒體的相關管理與運用問題，值得未來進一步的研究與觀察。

Knightley (2003, p. 504) 就指出，從1991年波斯灣戰爭之後，儘管新聞採訪的科技日益進步，但每一次的戰爭都可以目睹到政府媒體管理的日漸成熟與成功。2003年的波斯灣戰爭中，美軍的媒體管制已達到無情但卻有邏輯性。Knightley (2003, pp. 547-548) 預言，戰地記者的自主性時代已完全結束。在未來，新聞記者在戰時的選擇是，不是加入軍方嵌入制的限制與審查，就是冒著生命危險單獨進行採訪。總之，戰地記者的英雄時代已經結束。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王凱（2004）。《數字化部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李茂政（1999）。〈大眾傳播過程批評性的消費者〉，《傳播與社會》，世新大學新聞系編著。台北：揚智。
- 周俊雄（2004）。《2003年美伊戰爭媒體專業倫理與新聞採訪安全》，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段慧敏譯（2005）。《西方媒介史》。桂林，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胡光夏（2000）。〈我國軍隊的公共事務—軍隊與媒體關係之探討〉，《第三屆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集》，頁 67-91。台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胡光夏（2001）。〈戰爭、媒體與軍隊—以波斯灣戰爭為例〉，《第四屆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49-383。台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胡光夏（2003a）。〈戰爭、媒體與軍隊—以波斯灣戰爭為例〉，政治作戰學校軍社中心編《軍事社會科學實務研究》，頁 73-112。台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胡光夏（2003b）。〈2003年美伊戰爭新聞處理之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78 期，頁 193-219。胡光夏（2001）。〈軍事發言人角色之研究—以國軍軍事發言人室為例〉，《軍事社會科學研究專輯》，頁 75-94。崔蕙萍、鄭曉村譯（1984）。《凱撒的高盧戰記》。台北：帕米爾書店。
- 胡光夏（2005）。〈廣播運用於政治與軍事衝突之研究：以兩次波斯灣戰為例〉，《復興崗學報》，第 83 期，頁 89-116。
- 胡錫進、宋念申（2003）。〈前線報導：美媒體控制新聞 對伊戰爭不需解釋〉，人民網，3 月 23 日。
- 倪樂雄（2002）。《戰爭與文化傳統：對歷史的另一種觀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馬劍（2004）。〈遠古時代—商〉，《圖說中國歷史》，吳澤主編。台北：京中玉。
- 崔蕙萍、鄭曉村譯（1984）。《凱撒的高盧戰記》。台北：帕米爾書店。
- 張巨岩（2004）。《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與戰爭》。北京：三聯書店。

- 習賢德 (1996)。〈軍事新聞發布的表象與真相〉，《一九九六年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 陳衛星譯 (2005)：《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的歷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傅凌譯 (1994)。《新戰爭論》。台北：(原書 Toffler, A. & Toffler, H. (1993).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游梓翔、吳韻儀譯 (1994)。《人類傳播史》。台北：遠流。
- 程之行 (1995)。《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圖書。
- 聞亦道 (2003)。〈隨軍記者；Embedded Reports〉，《商業周刊》，385 期。
- 臧國仁 (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書局。

## 二、英文書目

- Bell, M. (1995). In Harm's Way: reflections of a War Zone Thug. London: Hamish Hamilton.
- Bennett, W. and Paletz, D. (eds.) (1994).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ruthers, S. (2000). The Media at War: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 Cate, Hugh C. (1998). Military and Media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Media Issues, edited by Sloan, Wm. D. and Hoff, E. E., pp. 105-119. Northport, AL: Visim Press.
- Cumings, B. (1992). War and Television. London: Verso.
- Cutlip, S. M., Center, A. H. and Broom, G. M. (eds.)(1994). Effective Public Relations.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Durent, W. and Durent, A. (1968).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Y: Simon & Schuster.
- Furneaux, R. (1964). News of War: Stor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Great War Correspondents. London: Max Parrish.
- Gerbner, G. (1992). Persian Gulf War, the Movie, in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H. Mowlana, G. Gerbner, H. I. Schiller, pp. 243-265.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 Getler, M. (1991). Do Americans Really Want to Censor War Coverage This Way?

- Washington Post, March 17.
- Hachten, W. A. (1992) (3<sup>rd</sup> ed.). The World News Prism: Changing Media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mes,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1989).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C.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C. (1997). The Media and War, in 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 A Critical Survey, edited by Corner, J., Schlesinger, P. and Silverston, R., pp. 206-231. London: Routledge.
- Haste, C. (1977). 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 Propaganda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llen Lane.
- Haste, C. (1977). 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 Propaganda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llen Lane.
- Hickey, N. (2002). Access Denied,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www.Cjr.org>. January/February.
- Hiebert, R. E. (1995). Mass Media as Weapons of Modern Warfare, in Impact of Mass Media: Current Issues, edited by Hiebert, R. E. and Reass, C. (3<sup>rd</sup> ed.). NY: Longman, pp. 317-326.
- Hiebert, R. E. (2003). Public Relations and Propaganda in Framing the Iraq War: A Preliminary Review,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9, pp. 243-255.
- Hila, M. and Hila, Judy (2004). Media at War: The Iraq Crisis. London: Sage.
- Hoskins, A. (2004). Televising War: From Vietnam to Iraq. London: Continuum.
- Keeble, R. (1997). Secret State, Silent Press. London: John Libbey.
- Kellner, D. (1992). The Persian Gulf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 Knightley, P. (1975). The First Casualty: From the Crimea to Vietnam: The War Correspondent as Hero, Propagandist, and Myth Maker.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Louw, P. E. (2001).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Sage.
- Louw, P. E. (2003).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A Public Relations Challenge for the Pentagon, Gazett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65:3, pp. 211-230.
- Luostarinen, H. (1992). Innovations of Moral Policy, in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H. Mowlana,

- G. Gerbner, H. I. Schiller, pp. 128-136.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 MacArthur, J. R. (1992). Second Front: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the Gulf War. NY: Hill and Wang.
- Marquis, A. (1978). Words as Weapons: Propaganda in Britain and German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pp. 467-498.
- Mathews, J. J. (1957). Reporting the War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NY: McGraw-Hill.
- Morgan, M., Lewis, J. & Jhally, S. (1992). More Viewing, Less Knowledge, in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H. Mowlana, G. Gerbner, H. I. Schiller, pp. 216-233.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 Morrison, D. and Tumber, H. (1988). Journalists at War: The Dynamics of News Reporting During the Falklands Conflict. London: Sage.
- Mott, F. L. (1966). American Journalism. NY: Macmillan.
- Mueller, J. (1993).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Gulf War, in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the Gulf War, edited by S. A. Renshon, pp. 199-226.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New York Times (1991). 15 Top Journalists See Cheney and Object to Gulf War Curbs, May 2, p. A16.
- Nohrstedt, S. A. (1992). Ruling By Pooling, in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H. Mowlana, G. Gerbner, H. I. Schiller, pp. 118-127.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 O'Heffernan, P. (1994). A mutual Exploitation Model of Media Influence in US foreign Policy, In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the Gulf War, edited by W. Bennett and D. Paletz.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31-249.
- Read, D. (1992). The Power of News: The History of Reuters, 1949-19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 T. (1995). Aspects of Political Censorship, 1914-1918. Hull: Hull University Press.
- Royle, T. (1989). War Report. London: Grafton Books.
- Sanders, M. L. and Taylor, P. M. (1982). British Propagand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Basingstoke: Macmillan.

-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arkey, J. (1991). Under Fire: U.S. Military Restrictions on the Media from Grenada to the Persian Gulf.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 Shaw, D. L. and Martin, S. E. (1993). The Nature, and Inevitable, Phases of War Reporting: Historical Shadows, New Communication in the Persian Gulf, in The Media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edited by R. Denton, pp. 43-70. Westport, CT: Praeger.
- Sims, R. (1983). The Pentagon Report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T. (2003). Defining News in the Middle East,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www.cjr.org](http://www.cjr.org).
- Taylor, P. M. (2003). Journalism under Fire: The Reporting of War and International Crises, in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edited by S. Cottle, pp. 63-79. London: Sage.
- Thussu, D. K. (200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ward Arnold.
- Tumber, H. and Palmer, J. (2004). Media at War: The Iraq Cri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Virilio, P. (1989).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London: Verso.
- Webster, F. (2003). Information Warfa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edited by D. K. Thussu and D. Freedman, pp. 57-69.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illiams, P. (1995). The Pentagon Position on Mass Media, in Impact of Mass Media: Current Issues, edited by Hiebert, R. E. and Reass, C. (3<sup>rd</sup> ed.). NY; Longman, pp. 327-334.
- Woodward, G. C. (1993).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e Military and the Press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in The Media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edited by R. E. Denton, Jr., pp. 1-26.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 Young, P. and Jesser, P. (1997). The Media and the Military. Melbourne: Macmillan.

( 投稿日期：96 年 1 月 18 日；採用日期：96 年 5 月 23 日 )